生命的礼赞：跨越五千公里的生命接力

新华全媒头条

阅读更多全媒体形态报道 请扫描二维码下载新华社客户端，订阅“新华全媒头条”栏目

新华社拉萨8月25日电（记者王沁鸥、字强、鲍晓菁）8月22日晨5时35分，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人民医院ICU病房外的走廊里，王晓云伏在丈夫李洪彦的床边泣不成声。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到有生命体征的丈夫。

半小时后，按照王晓云以及全家的意愿，已处于脑死亡状态的李洪彦将被撤除生命支持设备。之后，他将在离家3500多公里的高原接受器官获取手术，成为西藏首位器官捐献者。

这名从黑龙江前来高原参与路桥建设的普通工人，再也回不去家乡了。

但王晓云相信，在远方某位陌生人身上，丈夫短短50年的生命将会得到延续。

生命的故事

西藏南部山区中的国道560线某段改建工地，海拔4800米。这是李洪彦生前工作的地方。

身体不好的王晓云一直没有工作，更从未来过这里。当她15日凌晨第一次踏上高原的土地时，距李洪彦突发脑出血已近30个小时。病床上，5个月前才与自己挥别的丈夫已深度昏迷，只能靠器械维持生命体征。据工友讲，李洪彦发病时一侧身体已僵硬，另一侧的手臂在敲床求救。

医生说，治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悲痛过后，王晓云把女儿李嘉欣叫来，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如果你爸再也醒不来，把他的器官捐了吧。”

“捐器官？”与李家相识十多年的工友葛长明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震惊，“那是电视上才看过的事。”

手术专家团队成员姚自勤拿到王晓云母女签署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时也有些吃惊。他是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器官获取组织（OPO）主任，此前经手的几十例器官捐献中，很多家属都是在动员后才同意捐献的；而心脏等重要脏器，大多数人出于传统观念都会为捐献者保留。

但王晓云母女二人却在心、肺、肝、肾、胰腺、小肠、眼球等选项上都划了勾——能救人的，全捐了。

“我没多的想法，就想用他的器官帮更多的人。”22日清晨6时，王晓云在手术室外向里望着，“他是个好人，会同意我的。”

工友眼中的李洪彦也是个好人。

“他帮过的人太多了。”葛长明说，“这么多年来，遇到工友生活有困难，只要老李兜里有钱，一定掏出来给。多少年轻人都是他带的，技术从不藏着掖着。”

但李洪彦却没怎么给自己买过东西，葛长明说，这是因为他要给女儿攒学费。

2017年第一次进藏工作时，李洪彦患了高血压，家人不想让他再回高原。他用一句话说服了全家：“那里还是需要人去做点事的。”

“他觉得自己不仅是在挣钱，也在做有意义的事。”葛长明说，一次，有工友抱怨条件艰苦撑不下去了，“李洪彦当场劝解说‘那西藏的桥还是得有人建啊’。”

他为西藏修路架桥，直到把生命留在了这里。

▲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进行器官获取手术前，向捐献者李洪彦鞠躬致敬（8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沁鸥摄

生命的接力

22日晨6时39分，李洪彦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紧接着，手术团队进入手术室。7时20分，器官离体。8时50分，装有李洪彦肾脏、肝脏、角膜和视网膜的转运箱被运往拉萨贡嘎机场。

守在手术室外的王晓云抱着女儿泪如泉涌。

“父母一直教育我要善良。他们很伟大！”李嘉欣说，自己一直有签器官捐献协议书的想法，但并没有和家里沟通过。母亲的决定让她感到意外，但也骄傲。

这个决定也引发了更多改变。

由于西藏没有器官捐献的先例，李洪彦家属提出捐献请求后，山南市特向对口支援省份安徽省申请技术援助。安徽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启动捐献程序，向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申请后获批。在安徽红十字会协调员的见证下，西藏第一份《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签署完成，第一场为器官捐献者举行的告别仪式在手术前举行。在安徽、云南两省专家的努力下，一场跨越5000公里的生命接力拉开帷幕。

22日下午4时30分许，从拉萨起飞的航班降落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半小时后，李洪彦捐献的一枚肝脏和一枚肾脏运抵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晚7时许，另一枚肾脏、一对角膜和视网膜经空中飞行后运抵合肥。一小时后，移植手术开始。

截至23日凌晨4时左右，两台肾脏和两台角膜移植手术分别在昆明、合肥顺利完成。4名患者因李洪彦捐献的器官获得了新生与光明。

生命的回响

李洪彦的生命也在高原留下了回响。

“他是英雄。”藏族护士洛桑走出手术室后沉思良久，“我相信西藏的器官捐献者会越来越多。”

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副会长刘维新说，全国自2010年开始进行器官捐献试点，西藏相关工作起步较晚。但仅2018年1至8月间，西藏器官捐献志愿者新增人数已达原有登记人数一半，增长速度加快。借由这次捐献，西藏将加快OPO协调员培训和地方性法规制定，并为捐献者提供相关政策保障，在全社会弘扬人道主义互助精神。

刘维新表示，西藏将为器官捐献者建立陵园和纪念墙，“李洪彦的名字将刻在第一位”。

王晓云已与女儿返回了黑龙江老家。她说以后有机会，还想来西藏看看。

李嘉欣说，父亲一直会是自己的偶像。这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姑娘在葬礼上没有哭，只是离开前，静静地摸了摸父亲的脸。

“他的器官活着，他就活着。用到我父亲器官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地活着。”李嘉欣说。

（上接1版）“如果只盯着任期内的GDP，想着眼前出政绩，经济数据下滑时，利益诱惑时，环保的‘硬杠杠’就不可能不宽，减排的‘紧箍咒’就不可能不松，必须要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兴安盟委书记张恩惠在大会小会上反复跟干部们强调“定力”。

兴安盟制定了严守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三大红线”，以环境容量、环境质量和资源承载能力定布局、定产业、定项目。“有家央企开发矿泉水提出按年产100万吨来设计，如此超能力开采，用不了几年资源就会枯竭。”阿尔山市委书记高长胜说，宁愿发展慢一点，也不做祸害子孙后代的事。

深耕细作绿色产业

兴安盟着力探索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路径方法，在传统的种养业上突围，在深加工上突破，在旅游业上破题。

在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五道河子村，微风吹拂着一望无际的水稻。这是新型的旱作水稻，采用膜下滴灌技术，与常规水稻栽培相比可节水70%以上，具有省水、省肥料、省劳力和增产量、增效益的优势。“种植旱作水稻比种植传统水稻每亩增收200元，比种玉米每亩增收500元。”村支部书记杜文义说，全村17000亩耕地全部纳入合作社经营管理，改种水稻、甜叶菊、万寿菊、甜菜、杂豆。

兴安盟每年产生800多万吨玉米秸秆，超半数的秸秆被焚烧、被废弃。爱放牧（兴安盟）生物质新材料有限公司采用国际领先技术，利用秸秆为原料进行无氧炭化，生产优质有机肥以及本醋液、秸秆油等产品。公司总经理于哲伟说：“如果每年转化1000多万亩的秸秆，按照每亩地获利100元计算，可增加10亿元产值。”

兴安盟还正在建设千公里金哈达旅游风光带等景区景点，着力打造阿尔山国际养生冰雪节、中国速度赛马大奖赛、阿尔山论坛等活动，兴安盟旅发委主任孟铁牛说，良好生态开始转化为发展旅游业优势，旅游接待人数和收入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去年接待游客850多万人次，旅游直接就业2万人。

增绿色与惠民生和谐共进

盛夏时节，夕阳下的洮儿河、归流河波光粼粼，微风拂过，枝叶摇曳，居民三五成群在河道两岸漫步休憩。水在城中、城在绿中、人在景中，天蓝、地绿、水清，每一位到过兴安盟的人都啧啧称赞：北国风光、江南盛景。

美好环境满足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群众的幸福感还体现在红红火火的日子里。在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嘎查“开心农场”里，大人带着孩子在自家认领的区域里体验耕种、采摘。农场主白双龙说，他把2户贫困户、15户普通农户组织起来成立了服务公司，实行入股分红经营模式，去年收入38万元。

阿尔山市白狼镇鹿村，在密林中养鹿和野猪，帮助24户贫困户代养20头鹿，并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林场职工成功转型，全村人均年收入2.6万元，贫困户人均分红1.46万元。

2017年，全盟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45.3万人下降到4.9万人，贫困发生率由41%下降到4.4%；新增城镇就业1.4万人，引导农牧民转移就业16.3万人次；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分别达到26367元、9242元，比上年均增长8%以上；民族教育发展水平位居自治区前列；一批深加工和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全区第一条跨省快速铁路——乌兰浩特至白城快速铁路建成开通……曾经一度制约兴安盟发展的难题正在一一破解，落后地区跑出了加速度，一个活力迸发的兴安盟，正在北疆大地上展现绿富同兴的美好画卷。

挪穷窝 移穷业 断穷根

（上接1版）安康市汉滨区大竹园镇的七堰社区（原七堰村）是2010年7·18暴雨洪灾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当时全村死亡或失踪29人，部分村民的遗体至今还掩埋在因泥石流所形成的土坝之中。不少村民谈及当时情形仍忍不住潸然泪下、心有余悸。有村民说，过去雨一下大了，整个村里没几户能睡个踏实觉。“汛期来了，生活就像是在赌命。”

“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如何破解自然灾害之殇与贫穷落后之困，找到一条既解除灾害威胁又利于长远发展的路子，成为摆在陕西省决策层面前的一道难题。2010年7·18暴雨洪灾后，省委、省政府经过反复研讨，痛下决心启动实施陕南避灾移民搬迁工程。是年12月6日，陕西省政府审议了陕南地区避灾移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计划用10年时间，下力气实施陕南避灾移民搬迁工程。

七堰社区成为陕南地区首批移民搬迁社区，原七堰村的75户受灾群众搬迁至此。经过政府后续的规划、建设，七堰社区周边原来住在滑坡地区的627户群众也在这里安了新家。经过统一规划，社区分三期建起了别致的小洋楼，社区道路干净整洁、房屋错落有致、配套设施完善。居民倪瑞亮激动地告诉记者，住在这儿是“把心搁在了肚子里”，再也不用怕电闪雷鸣、刮风下雨了。

此外，记者在安康市紫阳县、平利县、石泉县，商洛市镇安县、丹凤县，汉中市汉台区、西乡县、城固县、勉县等多地也看到，陕南移民安置点基本全部选择在地理位置安全、地势平坦处建设，首先保障的是群众的安全。

数据是枯燥的，但却最有说服力。根据陕西省国土厅提供的数据，近年来，陕南地区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减少80%，洪涝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则减少70%，已搬入新型社区的近140万群众基本脱离了陕南山区地质灾害的威胁。

摆脱了灾害侵扰，群众吃了定心丸，脱贫致富也有了劲头。曹修林住进双星社区后，自己那颗“始终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现在，他在社区开起了小吃店，钱包渐渐鼓了起来，感觉“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而在2013年末搬迁至汉台区移民安置点石门社区后，吴润强住上了三室一厅的宽敞楼房，还拉起一支装修施工队，全家人均纯收入早已突破万元。吴润强说，如果不搬下山，根本没钱做买卖，因为全填进了修房子这个“无底洞”。

曾经的陕南山区扶贫的主要做法，是为山里群众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但灾害频发让投入很难见到成效。在西北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守国看来，与其不断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输血续命”，倒不如把整个村子迁出来，通过人口的二次聚集，给当地培育出“造血”的能力。“陕南实施移民搬迁，是找准了方位，开对了‘药方’，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

移穷业

让“一方水土能养一方人”

福建商人谢进财刚刚给自己的服装厂迁了址，从泉州到汉中市城固县的江湾移民搬迁社区，迁移的距离超过1500公里。但在谢进财看来，距离并非问题，相较于迁厂的开销，他更看中的是陕南地区的人力资源优势。“东南沿海的用工成本高，工人流动性强。陕南的人员工资相对较低，工人也安家在附近，用工十分稳定，厂里的订单能够按时按量高品质完成。”谢进财说。

很难想象，曾经贫穷落后的陕南山区，现在却依托移民搬迁积攒出人口红利，开始不断吸引产业聚集，吸引东部企业西迁落户。

从地理上看，陕南地处秦巴山区腹地，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自西向东穿流而过，山地面积占比接近85%，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从曾经的生产生活方式上看，这里的群众长期分散居住在深山，进山出山都颇费周折，既没有可以解决温饱的耕地，也没有发家致富的办法。

外出务工，似乎是陕南群众唯一的出路，从山西河南的煤窑，到江浙广东的工厂，到处都有陕南人的身影，打工经济一度成为陕南地区的支柱经济。有的人口大村，村里人自己开的劳务公司就有四五个，专门负责把人往出送。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陕南曾经的水土就养不活一方人。要想脱贫致富，就必须彻底扭转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传统的‘就地扶贫’进行一次变革，通过移民搬迁创造出新的发展空间。”陕西省国土厅厅长杨忠武说。

“摸着石头过河”，在推行陕南移民搬迁时，陕西就提出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要求，相比较于“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成为更能考核搬迁成效的“硬指标”。

但政策下达了，房子盖好了，不少群众却打了退堂鼓。安康市移民（脱贫）搬迁办公室主任薛玉发介绍，“群众此前的顾虑，主要集中在搬下山靠什么生计这个问题上，部分群众习惯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住在社区，远离土地，让他们很没有安全感。”

此言不虚。一直以来确有很多尚未搬迁的群众忧心忡忡地表示，在山上能靠山货、林果换钱度日，能吃自己种的菜，烧山上捡的枯枝。如果搬下山，就算房子不要钱，水费、电费、天然气费、吃菜买粮都要花钱，这些钱从哪里来？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但基础是产业。没有产业支撑，纵然高楼林立，也只能唱“空城计”。尤其是在贫困山区，要真正脱贫，必须有产业，创造出就业机会。进城农民才能安居乐业，真正扎下根来。否则，脱贫就没有根基，更难以持续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陕西移民搬迁从一开始就遵循“以产定搬、以搬促城、产城融合”的工作思路。

“靠城、靠镇、靠园区”，这是陕南搬迁社区选址的基本思路，可就业岗位还是不够怎么办？自己造！

在商洛市镇安县云盖寺镇，移民搬迁社区旁就是产业园区。当地政府在社区规划之初，就修建了8栋3000平米的小微企业孵化园标准厂房，对该小区的1.1万名居民而言，在家门口打工不再是梦想。“过去在外省打工，老人、娃娃都没人管，走远了操心。现在上班两步路就到，虽然钱挣得少点，但省去了在城里租房、生活的开支，还能照顾家里，已经很知足了。”在园区内普瑞电子公司工作的张静肯定地说。

因“鎏金铜蚕”而出名的安康市石泉县池河镇，建成的移民搬迁社区规模位居安康市前列。针对搬迁户的就业致富需求，当地因户施策，以农业、创业、就业为途径，为搬迁对象逐户逐人制定增收规划。县长周耀宜介绍，当地组织流转土地，通过支部引领、专业合作社运作、贫困户免费经营或投工投劳，发展种养殖业，带动贫困户增收。依托现代农业园区实现园区就业，引入社区工厂提供就业岗位，并在小区内建立创业孵化基地，扶持创新创业。

“对企业来说，选择在移民搬迁社区附近建厂，也是双赢。”入驻该社区的江苏的一二三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说，企业的快速发展，正是受益于搬迁社区形成的人口红利。

搬迁社区所带来的人口聚集，让“规模加工”在陕南山区真正落了地。“曾经陕南人口过于分散，发展什么都只能小打小闹，难成气候。现在动辄三五千，多则上万人口规模的移民搬迁社区，完全可以保障各类企业的用工需求。”镇安县委书记李波说。

除了谢进财，选择将厂区搬至城固县的还有主营高端女装制造的江苏南通商人邹浩。“这里的工人很勤劳，有强烈的致富愿望，愿意认真学，认真干，产品质量有保障。我计划加大投入，扩大厂区规模，将用工数增至650人。”邹浩如是说。

采访中，城固县长胡新利指着江湾社区边一处正在建设的工地向记者介绍：“这里正在为搬迁社区修建配套产业园，建成投产后，可为搬迁社区提供就业岗位2000余个，搬迁群众户均年增收1.5万元以上。”目前城固县正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推进产业园区、社区工厂、配套服务等建设，倾力打造“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产城融合示范区，计划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提供就业岗位，带动搬迁群众脱贫致富。

依托东部产业转移，陕南地区大量搬迁户已完成由普通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型，无论是在农业园区、社区工厂还是在入驻企业里工作，这些群众的月收入都能达到2000元以上。“一家只要有一个人能就近打工，全家的脱贫就有了保障。”邹顺生这样对记者说。

即使缺乏必要劳动技能，或因家庭、身体情况无法工作的，搬迁社区一般也配备有公益性岗位，保障这部分搬迁群众的增收需求。云盖寺社区的搬迁居民卜明清被安排在保洁岗位，每月能有1000多元工资。作为贫困户，卜明清家中多人有病在身，这份收入对家里非常重要。“我今年52岁，没文化不认字，复杂的活也学不会。没想到这样都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真的特别高兴、特别满足。”卜明清激动地说。

断穷根

根除滋生贫穷的深层土壤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地，陕南三市通过移民搬迁后的“人退林进”，年均治理水土流失2500平方公里、植树造林110万亩，汉江出境水质保持在二类以上；由于许多年轻人选择就地就近就业，不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三留守”（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矛盾得以缓解；近亲通婚减少，提高了当地人口质量，减少了智障残疾人群数量……

谈到陕南移民搬迁带来的综合成效，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康市委书记郭青使用了“溢出效应”这四个字。最令郭青感到欣喜的是，在陕南地区实施搬迁后，地方乡村环境、群众精神面貌也都焕然一新。曾经闭塞、落后的秦巴山区，逐渐变得进步而开放，曾经让贫困不断滋生的土壤逐渐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教育，曾是秦巴山区的“老大难”问题。分散居住在深山的群众无法保证子女上学，也不怎么重视教育，文盲比例高企，贫穷迭代高发。但现在，几乎在所有大型搬迁社区，都配备有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教学场所。秉承贴近城镇建设搬迁社区的初衷，即使是小型搬迁社区，其周边也有完备的教育资源。

在安康市汉滨区的晏坝社区，晏坝镇幼儿园工作人员王锦英本身也是搬迁户。在她看来，移民搬迁后，农村孩子与城里孩子间的差距也在缩小。“以前山里的娃儿光着屁股满山跑，哪上过什么幼儿园。现在，这些娃儿也有书看，也能学外语。娃儿们学得快，接受能力强，条件好了，教育也慢慢跟上了。”她感慨地说。

贫困户卜明清告诉记者，她的儿子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儿媳妇生下孙子不久就离家出走，孩子只能靠老两口自己带。“过去住在山里，我们俩没文化，就怕把聪明的娃儿给耽误了。现在孩子也搬进了城，成了城里人，能在学校里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能有出息，对我们来说比啥都强。”

让孩子能上学、上好学，是保障“斩穷根”的一份好礼。但省里送来搬迁群众的“礼包”并不止于此。

陕南移民搬迁，一直把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作为搬迁群众生活的重要保障，与集中安置点同步规划、一体建设。按照“小型保基本、中型保功能、大型全覆盖”的要求，依据集中安置点规模确定配套建设标准、内容和时限。邹顺生介绍说，“500户以上的大型安置点，一定要保障水、电、路、视、讯、网等基础设施全部建设到位，并配套医疗、教育、文化、卫生、超市、公墓、消防、生活垃圾、污水处理设施以及社区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实现服务功能全覆盖。”

进城入镇后的山区群众，享受着城镇化带来的便利，体验到信息爆炸带来的思想冲击，他们中很多人逐步跳出“大山思维”，主动从思想上与新时代对接。短短几年，不少当地人再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曾经困住他们的大山，又成了新的“聚宝盆”。

首先是各类农产品电商企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紫阳县的富硒茶叶、平利县的绞股蓝、山阳县的挂面都成为了网红商品，给当地群众带来不菲收益。同样发展迅速的还有旅游业，在安康市岚皋县，“旅游+搬迁社区”已成为当地群众最重要的脱贫抓手。岚皋县南宫山镇花里村的搬迁群众殷书玲喜言，一般赶上3天的小长假，她家里的农家乐毛收入就能超5000元，全年收入能有10多万元。

而对于此前就有想法、有手艺，但没有致富条件的群众来说，搬迁给了他们一次最好的机会。商洛市山阳县高坝店镇的姜启勇就因搬迁而致富，本身就有电器维修手艺的他从修理店干起，现在已把家中的门面房开成了电器行，主营大品牌的冰箱和彩电。“以前住在山里，骑着摩托一个村一个村的找活干，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现在小区的住户越来越多，大家生活越来越好，钱包越来越鼓，谁家搬新房，都少不了买几件大电器，我的电器不愁销路。社区几百户人家，再加上周边别的几个搬迁社区，即使没人买电器，靠维修和售后，我也有稳定的收入。”姜启勇说。

“从‘村民’到‘市民’，看似一字之差，却给当地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杨忠武说。数据显示，仅“十二五”期间，陕南50%以上的集中安置点都进入城镇规划区，75.2万搬迁群众进城入镇，陕南三市的城镇化率由此提高8个百分点。加上“十三五”前两年，从2011年实施的移民搬迁，已使陕南超百万群众完成由“村民”向“市民”的跨越。

城镇化率的提高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吸引越来越多陕南人返乡创业。汉中锐杰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汉杰，是城固本地人，上世纪90年代就外出务工，现在选择返乡投资建厂。他表示：“陕南的变化有目共睹，移民搬迁给当地带来全方位的变化，这里将成为新的投资沃土。”

“十二五”期间，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完成32.4万户111.89万人；“十三五”期间，陕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共计21.16万户69.92万人，避灾生态搬迁37.92万人，合计219.73万人。而记者采访中看到，这些搬迁群众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从灾害不断的险地到安居乐业的佳园，从贫困滋生的温床到投资发展的沃土。移民搬迁不但改变着陕南220万搬迁群众的命运，也正改变着整个陕南地区的命运。